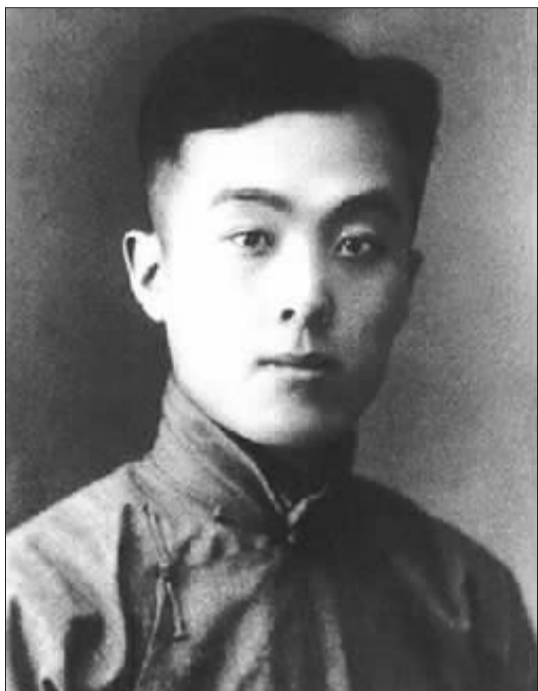


父亲对我来说,一直是生疏、冷漠的,我们不知道如何增进彼此的感情

季承:我和父亲季羨林



青年时期的季羨林

A 把母亲接来和父亲一起生活

1951年和1952年,姐姐和我高中毕业,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(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)。我去北京参加高考,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。翠花胡同那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,在历史上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。到了晚上,灯光昏暗,阴森恐怖,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房子里值班,极少有人敢深入大院。姐姐来北京时,也在那里住了几天,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,感觉很惊讶。

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,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。由于交通不便,我们很少见面。每个月,他会通过邮局给我寄15元零用钱,供我买书和零用。而每次汇款,父亲都会在汇款单上附言:“今寄去人民币15元,请查收。”仅此而已,我看了觉得很生分。那几年,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,他除了问我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,其他事情都不过问,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。我感到,父亲对我一直是生疏、冷漠的。

1955年夏天,我和姐姐同时毕业,并被分配到北京工作。父亲为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。他亲自带我们去王府井,在亨得利钟表店挑选,每块表花了一百多元钱,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。后来,我又花27元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,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。

在北京,我和姐姐经常相约星期天去看父亲。虽然我住的地方离他不远,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其他时间去看他。我们和父亲仍然

很生疏,去看他的时候,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,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,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。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,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,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。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,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,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。

为了促进父亲与远在济南的母亲和叔祖母团聚,我和姐姐决定由我们做起,尽量多与父亲接触,增进感情。可是,也许是我们做的不够,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,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。

一般来说,我和姐姐去看父亲,事先要商量一下,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,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、最难开口的事。有一次,我们终于涉及到一家人在北京团聚的事,父亲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和你妈没有感情。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,家庭团聚的事免谈,这让我们失望至极。

20世纪50年代,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哪还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。但在三年困难时期,粮食不够吃,副食品极度匮乏,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,挣扎过活,这使我和姐姐十分牵挂。于是,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,这次父亲未置可否,我便开始行动。1961年,我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了北京,让她们与父亲团聚。父亲对我和姐姐的举动虽有不满,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。

家庭团聚了,叔祖母和母亲自然高兴,可是我们心里并不踏实——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?

B 为保护父亲,我们干了几桩蠢事

“文革”一开始,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。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,就拿到楼后面焚烧。正烧的时候,一队红卫兵走过,立即过来把火浇灭,把剩下的信件拿走了。更为严重的是,红卫兵在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(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),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,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。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,不过,后来我们又做了不少蠢事。

北大抄家之风骤起,叔祖母为了给自己壮胆,就将一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。红卫兵来抄家时,发现了这把菜刀,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。他们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菜刀,父亲有口难辩,只好承受拳脚惩罚。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。

按照红卫兵的命令,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,由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住。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

置,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,占了很大的面积。时间久了,田夫人很不满,叔祖母是个急性子,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。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、一个紫檀木组合方桌、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送到西单旧货店卖掉了,一共卖了50块钱。第二天,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,又给添了5元。我们哪里知道,那沙发没什么,可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,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,是父亲在解放前夕购买的。父亲从农村回来后,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,大为心痛。

可我们干这些事,确实都是为了父亲好,虽感到懊悔却问心无愧。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几年,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,真是令人难以接受。可是,叔祖母个性坚强,不畏艰难,情况越险恶,她的意志越坚强。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。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质朴性格面对这场灾难,她们想

方设法为父亲做可口的饭菜,支持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,随时提防父亲走轻生的路。

父亲被关进“牛棚”后,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,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。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回去看一看,送点钱,安慰一下,仅此而已。有一次我回去,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。所谓准备,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匾,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,如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等,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。姓名要倒着写,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。他见我回来,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我如法炮制,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手脚,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,以免脖子受罪。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,他表情严肃,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。他虽然念过许多书,走过许多地方,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,除了愤怒之外,也只有茫然。

C “文革”考验了季家的每一个人

我和姐姐单位的“文革”运动也开展起来了。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“四清”运动,被调回北京参加“文革”。

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,运动也是双重的。我当时是党总支委员,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,每天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。我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当权派,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,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。于是,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

里无所事事。后来,我觉得这样不行,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。于是,大家支持我组织了一个“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”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。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,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,直至所谓“一月风暴”夺权后离开。

那段时间,我饱受考验。我妻子在国家科委工作,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,她保护所有的领导干部,不管他们是好还

是坏。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,我也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。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,她才表示,如果我是“五一六分子”,她就和我离婚。

我姐姐在“文革”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,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。她是较为正直的人,姐夫则有自己的人生哲学,谁也不得罪,对谁都没意见,什么派也不参加,平稳地度过了“文革”。“文革”是一场浩劫,它考验了季家的每一个人。

(据《南方周末》)



季承与家人合影(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),前排自左至右:表弟常永德,母亲;后排自左至右:季承,婉如姐。